

# 以鲜明的人物形象 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评李健彪的《达浦生评传》 □米寿江(回族)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彪先生28万字的报告文学《达浦生评传》(此书为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因达浦生大阿訇是南京人,加之李健彪先生也曾来南京查阅资料和调研,我作为时任南京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参与了全程接待和安排,故了解《达浦生评传》的写作过程,并有幸第一时间获赠此书,阅后颇有感慨!

众所周知,文学的本质是人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将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而影响人、教育人、启迪人生,一直是文学的主要任务。《达浦生评传》以章回体创作的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的典型形象。

达浦生(1875—1965)是中国伊斯兰教现当代的大阿訇、知名的民族教育家和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64岁的他自费赴海外宣传抗日,历时8个月,受到埃及国王、沙特国王和巴基斯坦国王的接见,发表了长达100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伊斯兰教经学院,并两次担任中国朝觐团团长,82岁时以周总理顾问的身份出席万隆会议,后又多次率团出访,扩大了新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和高度评价。位于南京的达浦生纪念馆,早在2006年就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11年又被国家宗教局命名为“全国第一批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达浦生是一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常强、又非常爱国爱教的大阿訇。抗战爆发,他说:日寇屠杀中国人时,不会区分你是回族还是汉族,所以只要是中国人,都应奋起抗日。1938年2月,当埃及国王法鲁克在王宫接见并宴请达浦生时,达浦生对国王讲:“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地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王听后赞叹不已,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抗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回族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回民文化促进会,由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回族各界人士30余人担任理事,发扬回族优良文化传统,共同致力于抗战救国大业。

在《达浦生评传》中,有名有姓的回族人物将近200位,尽管许多回族人今天已经鲜为人知,但作者通过对达浦生生平的回顾,不仅展现了达老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真实再现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社会百年变迁的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回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和感

我国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歌手和诗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诗人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他们以高昂的激情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表达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幸福感。在形式上吸取传统民歌的表述方式,有的诗人直接用民歌形式写作,比如壮歌、阿里郎、好来宝、阿肯弹唱等,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特征。特别是少数民族叙事长诗,或从民间文学吸取营养,或取材于革命历史,或立足于当下社会,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示各民族的历史现实生活与精神风貌,为丰富当代中国诗歌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诗歌蓬勃发,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群,新人辈出,精彩纷呈。最近笔者读到丽江10位“80后”及“90后”诗人的作品,深深震撼于丽江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诗情。从这些有限的作品中亦可窥探到这些青年才俊内心的丰富和想象力的丰盈。这些作品不但饱含生活的深度与情感的浓度,而且语言纯熟自然,诗意盎然,说明这支年轻的队伍已经成长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坚力量,也预示少数民族诗歌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

虽然来自同一块热土,但是每个诗人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悟大相径庭,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品格,让人倍感欣慰。在此抛砖引玉,以期能对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 生活的温度与情感的浓度

这其中的四位女诗人以敏锐而细腻的心感悟生活,从看似平常的人与事中营造出动人的诗意。普米族诗人桑娜卓玛的《大山的温度》回望生活的艰辛,表达对大山对大地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充满浓郁的乡土情怀。作者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采用白描手法,通过生动的意象构成一个个乡村生活画面。“八月,雨水总喜欢给村庄把脉/抚摸这片土地上干涸的呐喊”,诗作的开头采用拟人手法,把雨水人格化,表达对雨水的感激之情。而后描绘家庭的生活状况,如:父亲的叹息

人事迹,书中披露的许多细节令人难忘。比如,1938年7月,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受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访问埃及,他在《海外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他们(指达浦生等人的学生)所进的学校,是世界上古老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他们在勉强的生活费中,还提出一些钱,在海外对侮辱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抗宣传。”陶行知还写下了他最受感动的场面:“到了埃及,还有一件事是我印象最深的。在尼罗河畔阳光笼罩下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三十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发自内心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古老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陶先生被海外回族学生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巍巍金字塔,浩浩尼罗河。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这里所展现的就是根植于回族留学生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回族千百年来传承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达浦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救国是他毕生的追求。作者李健彪长期从事政协文史工作,资料积累厚实,故能以丰富的口述史塑造人物生动鲜明的形象。书中他记述了达浦生的孙子达杰的回忆:“在任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时,老人明知某些教师是共产党员,但对他们的抗日进步活动不干涉,甚至暗中支持,老人对党是有感情的。”达杰曾问达浦生老人:“创办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为什么要去西安‘八办’聘请教师?”达老回答:“因为他们爱国抗日。”正是这种朴素的认知,使达浦生在多次的人生抉择中,能选准方向,实现他的人生理想。

实际上这本书并不好写。达浦生一生跨越三个历史时期,经历非常丰富,并始终是宗教上层人士的代表,有人说他是“三朝元老”,如何准确把握他在不同历史、政治背景下的言行确实不易。所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政治、政策的理解力、洞察力成了创作这部人物评传的关键。身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李健彪曾在宣传部门工作16年,同时又有民族学博士的学科背景,担任着副省级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从而使他在写作时,对宣传导向的把握、对政策的理解都比较到位,送审时也赢得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充分肯定。再加上作者祖父与达浦生又是世交(抗战期间达浦生携家人在西安居住近10年),这些综合的条件和素质为他成功地写好这部人物传记提供了可能。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详实资料考证和田野调查,解决了不少学术界长期以来困惑的问题,该书的权威性也为学术界所重视。

《达浦生评传》彰显了一代民族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的情怀,它描写细腻、生动,表现了主人公的隐忍、无奈、苦楚和胸怀,揭示了他不同时期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使命追求;它评述客观公正,从历史的维度出发,不神化,不溢美,善于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



展现,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成功地表现出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一个回族宗教人士如何将自己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在书中,达浦生清醒的大局意识令人钦佩,在(祖)国与(宗)教同患难之际,他没有屈从日寇的淫威,年过六旬仍率先为国挺身而出,漂洋过海,不辞劳苦,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没有国就没有教。在国与教面临新的征途面前,年已八旬的他仍积极为国效力,民间外交取得显著成效,为共和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可以说,达浦生鲜明的家国情怀在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达浦生是一位杰出的伊斯兰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30万字的《伊斯兰六书》,代表了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达浦生也因此与胡适、冯友兰等人一起被海外学者列入现代中国十大哲人名单。之所以将达浦生列入其中,给出的原因是:达浦生是“中国伊斯兰经汉双修的人物,其《伊斯兰六书》将指导代代的中国穆斯林”。应该说,海外学者的这种认识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但要解读这样一位伊斯兰哲人的思想,对常人而言无疑是困难的,而李健彪在书中却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这部人物传记,可以生动形象地了解在中华大地存在了上千年的伊斯兰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人物传记是了解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对促进当前的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生生不息的诗情

□杨玉梅(侗族)

落在猎狗的心尖上,风把母亲的焦虑吹散到山林里,我和姐姐的成长让这个家锁紧呼吸,猎狗从神山带来祖辈的指引,群山收容了一家人的困苦。生活的艰难通过具体生动而别致的意象表达出来,产生独特的诗意、新意和美感。

白族诗人冯娜的诗题材广泛,想象丰富,思想深邃。她从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引发诗情,充满对生活对生命的独特发现和思考,显示出非凡的文学眼力与创造力。虽然她现在离开了丽江远在广州工作,但是她的文学禀赋无疑源自于她诞生的土地。她在《出生地》中说:“我离开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是为了灰灰不必复燃”。

彝族诗人李凤的组诗《渴望风起》和张婧(纳西族,“80后”)的组诗《歌》都是关于生活与生命的歌吟,充满沉甸甸的人生况味。李凤的这组诗重点阐释爱的疼痛与生之困境,传达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生命的独特感悟,诗意隽永。如《爱》通过“爱”这个字来阐释爱的内涵:“爱,这个字/因为斟满意义/而摇摇晃晃/握紧在每个人的手里”。

《放生》以人物对放飞风筝、放生金鱼反观对搁浅到身边的鱼儿视而不见,启示人们对放生行为的深沉思考。《夭折的儿子》以一位年轻的父亲在梦境中都无法向夭折的儿子伸出双手,委婉而深刻地传达出爱的疼痛与无奈。

张婧的组诗由《村歌》《情歌》《梦歌》《哀歌》《女人歌》《行歌》《离歌》《魂歌》组成,题材包含

乡村的田园诗意、童年与梦想、爱情的秘密、岁月的更替、生命的悲欢离合等,涵盖着丰富的生命内涵。如在《村歌》里诗人魂归大地,想象出一幅乡村诗意的生活美景:早晨跟村庄一起苏醒,到河边洗脸,甩出一头亮丽的长发,打一壶清水煮煮草药,漫步曲折的山路,在山顶写作,在炊烟四起的黄昏,劈柴生火,做一顿飘香晚饭,为每粒大米动情,在亲朋好友的笑语盈盈中忘却辛劳。

## 独特的情感与浪漫的抒怀

彝族诗人吉克木呷和傣族诗人五噶的诗歌风格相近,语言自然朴素,明白晓畅,感情浓厚而又亲切空灵,充满浪漫情怀。尽管如此,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吉克木呷的诗多倾向于表现诗人的生活,视野开阔,透露出融万物于体内的气魄;而五噶的诗侧重于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更富于幽默情趣和浪漫气质。

吉克木呷的诗歌题材包括故乡的种种物象,如老房子、土地、彝族老妈妈、乡村生活、饮水的牛、搬弄米粒的蚂蚁等。作者对每个描写的对象都倾注深情,每个意象都浸润着诗人对生活的爱和对大地的情。如《故乡有时很轻》采用复沓手法,通过“故乡有时很轻”“故乡有时很重”“故乡有时很矮”“故乡有时很高”表达对故乡的感念,意象清晰,感情真挚。《我要一帧一帧地爱你》也采用复沓手法,层层递进,表达爱的热烈。《指纹》

前一段,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两河口》(《民族文学》2020年第1期),取得了新一年创作的开门红。这一厚重的作品着力关注与思考了城市化进程给我国城市郊区农民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表现与探讨城郊农民身份转换、展示城郊农民生活新前景等方面显示出许多新的亮点。

作品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对农村城市化进程做出了理性的思考并给予了温情的文化关怀。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城市规模而言,大、中、小城市面积普遍成倍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农村的城市化及相应而来的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规模宏大与新的社会生活潮流。鉴于于此,许多作家积极融入时代,坚持为人民写作,积极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并及时在写作中关注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农民生存命运带来的冲击。《两河口》思考与尝试回答的时代命题,是中国农民如何应对城市化潮流的问题。两河口村处在我国大西南交通枢纽城市——大鹏市龙坪县,是一个有着2500余人、3000多亩耕地、靠种植大棚菜与开办农家乐不断走向富裕生活的行政村。市里为了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南、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决策,决定在两河口建设一个集生产、加工、集散与流转于一体、西南五省周边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两河口村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由于时代的发展,向本贵在作品中农村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与20多年前的贾平凹写《土门》时有了很大不同,也有了认识上的挺进。在《两河口》中,乡村城市化不再是《土门》中城市盲目扩张对乡村带来的无情挤压,而是国家实施战略决策、兴邦惠民政策给西部城郊乡村现代化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需要。对国家的经济战略布局,两河口村民给予了充分理解与鼎力支持,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拆迁工作完成之顺利出乎领导的预料。虽然,与仁厚村村民一样,两河口村民深怀着对土地和生存家园的眷恋,从心理与情感上对搬离家园有太多的不舍,但他们还是理智地接受了这一巨大的生活变迁,选择了与时俱进。在这里,向本贵写出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善良与识大局、顾大体,写出了中国农民与国家共命运的博大心怀。

《两河口》的另一写作亮点,是写出了城市郊区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换身份、破茧化蝶的壮丽历程,展示了他们寻求幸福新生活的辉煌前景。向本贵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一旦失去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势必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就业或饭碗的问题。而缘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家现阶段也无法包揽城郊拆迁农民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这样的话,转变观念,勇敢地告别过去农民的身份,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自主创业,在城镇化进程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新市民的身份拥抱与开创未来,成为城市郊区农民的生活抉择。尽管这一过程会极其不易,尤其是会经历转换思想与生活的阵痛,但势在必行,无法逃避。实际上,执政为民是党和政府的宗旨,政府时刻都在关心群众的利益。政府实施城市化决策不但是惠民政策的体现,也为城市郊区农民实现身份转换、寻求新的生存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作品的一个重要文学贡献或收获,便是写出了两河口村民在这一过程中“华丽的转身”。搬迁之后有一段时间,两河口村民除个别(如伍福安)之外,大多陷入了生活与思想的双重困境,一度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他们要么打牌赌博,乃至输掉了政府下发的大部分拆迁费,要么从事一些文化、技术含量低的苦力活,收入微薄。如果不是老支书为制止赌博而死亡,许多家庭都存在赌博引发的家破人亡的危险。但这些都是他们暂时不适应城市化生活环境的表现,是他们走出传统习惯和心理阴郁必需经历的艰难过程。终于,生活的转机不约而至。原来的种粮能手杨文广改行做了瓦匠与石匠,很快在土建工程中积累了经验,成为土木工程公司经理。复员军人出身的村支书与村长丁有旺一度靠拉板车为生,很快也在丁行长、原县委书记、商贸物流中心赵同生主任、杨杰副市长等人的启发、关心与支持下,成立了两河口广告装潢公司,担任总经理,在资本运作、人才招聘、工程策划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知识陡涨,再次进发了自己见多识广、组织与号召力强的优势。其他村民有的(如周金珂、美美)开办了水上乐园、商铺等等,有的甚至做起了电商,把本土特产销往全国大都市。这无疑是中国农民的新时代蜕变。在《土门》中,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让仁厚村村民对于城市的老板、经理抱着难以动摇的抵触心理,他们因此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举棋不定、徘徊不前;而《两河口》中的两河口村民则勇敢地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糟粕,积极接纳新思想、新文化,选择了与时代同行共进,也迎来了新的幸福生活前景。向本贵在作品中多次用“华丽的转身”来形容两河口村民的时代蜕变与身份转换,特别富于艺术的韵味,也由衷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改革创新精神的高度礼赞。

除此之外,小说还表现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重要主题并形成多声部合唱,也能引发读者的深思。比如,对于城市化进程,向本贵在理智上是十分认同的,尤其是高度理解与拥护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一带一路战略决策,因而在作品中高度赞扬了两河口村民对城市化潮流的支持与顺应。但也看得出来,他对乡村与乡村文化也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钟爱之情。或许在他看来,无论是城市化、工业化还是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人带来福祉,促进历史进步,也可能产生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也好,农业文明或乡村文明也好,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所短。只是在中国现代化特定背景下,城市化主导了社会生活的主流。而全国大多数乡村事实上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保持着青山绿水的生态美。因而在描绘两河口乡村风光时,向本贵总是一再而再,再而三地渲染那种桃红柳绿、炊烟袅袅、小桥流水、鸡犬相闻的田园牧歌情调,仿佛在召唤乡村生活的诗情画意,也让读者久久沉浸在乡村生活的优美、洁净与恬淡之中。对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河口吼水,向本贵更是赞不绝口,大呼保护与传承。对于原村会计伍福安的灵活经济头脑,向本贵进行了肯定,但对其金钱主义、人情淡薄、亲情冷漠、短期行为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所作所为及其恶果,向本贵表示了严厉的批判,也显示出他对城市化进程的警惕。对于政府领导与群众鱼水之情的动情书写以及由此凸显的作家为人民而写作的赤子情怀、对于农村脱贫致富路上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重视、对于城市商贸往来中诚信伦理的倡导与呼唤,等等,在作品中都形成了强烈的声音或情感力量,并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通过生活的小细节引发诗情。吉克木呷的诗语言自然朴素,意象平凡,可是深切的情、独特的构思和美好的心灵让诗作从平凡中闪烁出光芒,令人动容。

五噶具有古代山水田园诗人的闲情逸致和豪放派诗人的潇洒浪漫。他的诗语言轻盈温润,不是表现生活的沉重与忧伤,而是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表现独特的生活情趣和生命体验。如《秋天留给了我一面湖水》说秋天走后给乡亲们留下了果实,给“我”留下了一面湖水:待到落雪时/我定将披蓑戴笠/泛一叶小舟于湖心/煮酒垂钩。这个意境正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现代翻版。《深山饮酒记》书写大醉后的豪情:“捉笔在月光上/洋洋洒洒写下上千诗行/次日醒来/月光已走/文字皆飞/只有笔打着鼙声/睡在门前的青石板上”。

杜向阳的组诗《风景画》也是写景,却跟五噶的诗风不同。五噶是借景抒怀,神思飞扬,大胆而丰富的想象让情感与文字插上飞翔的翅膀,表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杜向阳则重在写实,是冥想静观。《风景画》描绘的主要是诗人眼中的风景,这道风景不仅包括自然风光,还包括社会人生百态,但是作者的叙述一般是冷静的客观描写,而少有个人情感的流露,有时在静观中隐含对生活对自然的哲理思考,总体而言自然风景显得沉静,社会人生景观颇为沉重。

彝族诗人阿卓日古的组诗《站在风口》书写乡村、故乡、炊烟、老屋的石头、母亲的土豆、阿斯老人、神鹰等,表现出对亲人对乡村对故土的深切关怀,隐含对生活对自然的哲理思考。如他回忆是一种失落,故乡和村庄的许多人,就是在回忆中被想象而忘记,从熟悉的生活中感悟出具有陌生化意味的联想。再如《半辈子》写诗人笔下的人物由烟鬼变成酒鬼变成柔弱的病号,半辈子活出来的是苦累和苦命,表达出诗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绪。

## 超越与创新

诗歌是语言高度凝练的艺术,也是情感的艺

# 身份转换与城郊农民生活的新前景

——评向本贵长篇小说《两河口》

□吴道毅(苗族)

术。诗歌之妙是情感感变成可以感触的形象,通过生动鲜活的形象表达情感和思想。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并非易事。许多看来简单自然朴素而充满诗意之美的诗歌,其实是诗人对生活进行深思熟虑和艺术上的冥思苦想而得来的。超越与创新是每位诗人的使命。普米族诗人戈戎玳措和纳西族诗人寸杨勇勇于创新,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在诗歌写作日益同质化的时代,追求写作的难度,寻求新意和新奇,这种诗歌精神与创作态度弥足珍贵。

戈戎玳措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他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以一个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审视生活,从现实的一个个文化碎片中追忆历史,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祖先、祭坛、勇士、出征、笛声、部落、经文、祭司、族人,这些充满民族文化意味的意象,通过诗人的想象和幻想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阂,别具意味。

如《提示》,诗人从现实存在的祖先的祭坛望过去,想象石板在马蹄声中松动,勇士发出战斗的呐喊,出征的漫漫夜难眠女人含泪守望。祖先的祭坛提示着民族从远古走来,从战争与动荡中走来,“女人们的泪水淹没了云彩的构想”,也是从离别与苦难中走来,启人不忘历史,珍惜当下。在其他诗作中,残缺的经文、木楞房、神山,等等,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意象,都在作者的想象中得以诗意呈现。

寸杨勇写作的难度不在于民族文化的挖掘,而是力求突破传统思维和写作模式,从平常琐碎的生活中发现新意,赋予日常生活以深邃的内涵。如组诗《沿着季节的水回溯》别出心裁,打破惯常写法,把“序曲”和“尾声”颠倒,按照从“十二月”到“一月”时间倒流的方式营造诗情。以季节自我,但不是书写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书写自我的个人体验和感知的世界。如《七月,母亲躺在医院的床上》描写病中的母亲,母亲说,“这时间真难熬啊,一滴药水好像一年。”母亲滴水不能进,她说“她想坐在村头那眼泉水的中央”。这两句话就是诗,生动地道出了病人的疼痛和干渴。